

第七章 合浦港兴衰及其衰落的历史启示

第一节 合浦港的兴起和繁荣

汉武帝雄才大略，“外事四夷”：南平两越、北击匈奴、通西域、开发西南夷、东定朝鲜，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是汉帝国的极盛时期。汉武帝积极开拓的中亚商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陆上丝绸之路，时常发生动乱，忽通忽断，而且安息商人为了牟取暴利，故意从中阻隔，虽经张骞出使，历经艰难，也难以改变这种多变的局面。汉武帝遂又采纳张骞通过“蜀身毒道”，先与印度接触，再从印度出发直达中亚的建议，但这条通道要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沿途多原始森林，深山峡谷，大都是崎岖山路、栈道索桥，稍有骚扰，便会被阻断，比西北的高路更难保证其畅通。所以，张骞生前始终未能打通^[1]。及至汉武帝平定此前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全面控制了北部湾及南海沿岸后，注重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汉武帝便着手开通一条从合浦郡出发、与西方往来的海洋通道^[2]。于是，北部湾地区一跃而成汉王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合浦这个新置的郡县，也在对外贸易的带动下，逐步走向繁荣。

合浦港的兴起，虽是大局时势使然，但背后的促动因素是多方面的。至少还与下列几方面关系密切。

其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通达海内外的交通便利。北部湾地区地处亚热带，常年适合航运，由于水域受地形阻隔，风平浪静，是一个少有的天然海湾。合浦居江海之交，以南流江为干流，境内河流水网交织，舟楫可行，水上交通甚为便利。通过灵渠，便可沿湘江进入长江水域，形成沟通岭南与西南、岭南与中原联系的重要交通线。从合浦扬帆出海，也就成为汉王朝通往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海路航线。

合浦也可通过东南沿海沟通中原，《后汉书》记载交趾七郡向汉王朝的进贡，大都在今福州一带转运，但就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而言，从北部湾往东的海路实为险途，代价太大，谓“讯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故于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峽道，于是夷通为常路。这样，除上述水路之外，通往岭北的峽道也可供选择，使得东汉时期合浦与内陆腹地的交往进一步扩大。

其二，北部湾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传统交往。早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广东、广西、香港、云南等地，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的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则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3]安志敏很早就注意到东南亚发现的刻纹硬陶与我国华南一带所出的相似性，认为马来西亚柔佛州所出土的这类硬陶“很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而输入的”^[4]。秦汉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更为密切，“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5]这些海外输入的物品，通过在包括北部湾地区在内“粤地”进行贸易，贩往中原，说明了北部湾地区凭借与东南亚、南亚的地缘优势，在官方航线开通之前，民间自发的、接力式的贸易由来已久，并在长期的交往中，双方对于交通路线、各自物产、语言和发展现状有了充分的认知。随着汉代造船技术的逐步提高和对海洋认识的增强，武帝时期正式开通从合浦郡的合浦和徐闻两港出发的远洋航线，便也就水到渠成。

其三，基于固边的政治、军事考量。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地处汉王朝统治的最南边，地域狭长，控制着北部湾和南海西面漫长的海岸线，是西方使团和商船的必由之路，汉王朝不得不以合浦来加强对交趾三郡的钳制，确保边疆安宁。事实证明，此不失朝廷的远见之举。东汉建武年间，交趾征侧征贰姐妹反叛，连掠 65 城，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十八年（公元 42 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至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永和二年（公元 137 年）、建康元年（公元 144 年）、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该地区还多次发生叛乱，波及合浦等地，后均被降服^[6]。平定交州的叛乱，使合浦的军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马援征交趾时，驻军合浦，并以合浦为据点，率“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7]。合浦东南面的海南岛也不太平，叛乱连连。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在海南岛置澹耳、珠崖两郡，《汉书·贾捐之传》记曰：“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 86 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公元前 82 年），罢澹耳郡，并属珠崖。至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珠崖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珠崖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元帝听从了贾捐之的疏奏，下诏罢珠崖郡^[8]。汉军平定反叛的路线，由灵渠入漓江，沿桂江、北流河、南流江一线直下合浦放洋渡海，“从水运看，此线最方便。”^[9]正是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中央王朝对岭南边郡的统治中，合浦逐渐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其四，朝中权贵对奢侈品的追逐。率使团出海的“黄门”，隶属于少府，而少府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他们带回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多是价高质优、便于携带的珠饰，这些珠饰盛产于东南亚和南亚，较早时期已为朝中权贵所得知。作为交换品，是使团带去由皇帝赏赐的黄金和丝绸。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初，更似是皇帝追逐奢侈品的个人行为。不过，随着民间资本的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扩大，佩戴象征财富和地位、西方学者称之为“威望物”（Prestige goods）的珠饰，逐渐成为权贵和富有阶层的时尚。西汉晚期开始的密切交往，也使得贸易不再局限于那些拥有高价值、赋予地位及可以限制交换的物质，伴随而来的还有更为广泛的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

随着西汉中期合浦港的兴起，南北商贾云集，合浦相对于其他一些边远地区而言，迅速并入汉王朝体系进而得到长足发展^[10]。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珍珠开采和以玻璃、琥珀、玛瑙等珠饰加工为主的手工业发达，一些特定的手工业阶层，大量生产满足权贵阶层垂涎的精美珠饰，并通过内外贸易，开创了合浦港经济的繁荣局面。

珍珠的开采和加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合浦采珠历史久远，文献有较多反映^[11]。除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珠还合浦”外，《后汉书·马援传》还载光武帝时马援南征交趾，曾驻军合浦，返京时运回一车薏苡种子。马援卒后，遭朝中权贵诬陷，言其所载还京者是珍珠等宝物^[12]。这些记载不但说明合浦盛产珍珠，还从侧面说明朝中权贵对这种奢侈品的垂涎。当时合浦产的珍珠，主要是内销，以流入交趾（今越南北部）者为多。境内几乎“不产谷实”，以致靠卖珍珠从交趾“贸余粮食”，由此推测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事采珠及交易。可见，当地采珠业已具相当大的规模。

玻璃制造业也比较发达，大量出土的钾玻璃珠有相当部分在本地生产，并参与到印度洋一太

平洋珠的贸易。2009年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19届国际印度—太平洋史前学会大会上，兰克顿(Lankton)等做题为“泰国半岛发现的类似广西汉代玻璃杯残片的化学成分分析及数据解释”的报告，提及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东岸素叻他尼府的塔差纳(Ta Chana)以及西岸拉廊府村庄 Bang Kluyay 发现了10件玻璃器皿的残片，其环形打磨痕迹、弦纹等特征类似广西出土汉代玻璃杯的器皿残片，时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经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分析，9件均属于低钙亚类钾玻璃，1件属于钾铅玻璃，均具有高的铷/锶比例。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泰国这些玻璃器皿残片中的深紫色样品为锰离子、钴离子共同着色；蓝色、深蓝样品为钴离子着色，与广西多地出土的蓝色玻璃杯、玻璃珠等同类别钾玻璃器成分特点一致。素叻他尼府发现的含有少量铅、锡的2件样品，与贵县贵汽路M5以及合浦县母猪岭M1出土的玻璃盘成分接近，而另2件灰绿色钾铅玻璃，则与合浦风门岭M26、九只岭M5发现的绿色玻璃珠的成分类似。他们认为，泰国素叻他尼府发现的这些玻璃器很可能是由“交州刺史部”传入的^[13]。泰国班东达潘发现的低钙钾玻璃只占分析样品的3%，本地生产的可能性很小，也可能为同一来源^[14]。还有学者认为，包括合浦在内的广西玻璃类型还向西远涉重洋到了印度，主要证据是阿里卡梅度遗址出土那件著名的玻璃杯残件，与广西所出惊人相似，而从未令人信服地被归入任何一类已知的地中海玻璃型式^[15]。

此外，之前提及的琥珀、玛瑙等珠饰，有相当部分为输入原料，在当地加工。这些自制的珠饰，也随着贸易和交流向内陆及沿海其他地区传播。

合浦汉墓群展现了合浦作为港口城市的昔日繁华。现存的一千多个封土堆以及上万座汉墓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县城一带，从已发掘的汉墓来看，以木椁墓和砖室墓为主，极少构筑简单的土坑墓。出土器物丰富，生前器用大多具备，且在中原青铜式微之时，这里篆刻或模铸、纹饰精美繁缛的青铜器大放异彩，其中成套的铜制井仓灶模型明器，国内仅见于合浦的4座汉墓^[16]。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合浦汉墓出土与海外贸易相关的珠饰，其分布之集中，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巨大，为国内甚至世界所罕见，是研究汉代中西贸易和技术传播的重要标本。在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埋葬习俗中，体现出了当时合浦社会的充盈和富庶。此等富饶，有如清代顾祖禹所描绘：“府（唐贞观八年合浦改为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阯，固两粤之藩篱，控蛮僚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17]

第二节 合浦港的衰落

三国时期，合浦属孙吴辖地。从大一统国家到三国分治，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合浦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孙权之孙孙皓即位不久，便于宝鼎二年（公元267年）重新营建宫殿，规模宏伟，装饰珠玉，耗资巨大。动工时正值盛夏，农业和守备具废，于是徐陵亭侯华核上疏谏，其中提及合浦一带的严峻形势，曰：“……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18]当时合浦社会的动荡不安，就显而易见。

尽管交州一度危急，但在孙吴政权的苦心经营下，南洋的海上交通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由于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建业（今南京），从广州顺北江或沿海而上，距中心地区较近，交通方便，因之广州的港市地位自然日渐上升，故此“至迟在三国时期，南方的最大海港，又转移到

广州了。”^[19]造成广州取代合浦成为岭南大港这一局面，故存诸多政治、经济因素，但合浦港走向衰落的决定性因素，还是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西汉中期开始的海外贸易，由于受当时船舶规模和航海技术所限，主要是沿岸航行，合浦因而成为这一远洋航线的始发港口和水路枢纽。三国时期，东吴已能建造万斛大船，同时也掌握了棹橹驶风航行技术，航行的目的地也不再局限于前朝的印度，而是西渡阿拉伯海到达东非和大秦^[20]。从广州等地出发的船舶开始能直接穿过南海，就不必沿北部湾沿岸航行，因而绕开了合浦。这一离岸跨海远洋新航线，六朝文献多有记载，也在当代南海的水下考古发现中得到了证实^[21]。越南南部俄厄遗址等几乎没有发现东汉以后的中国遗物，也佐证了航线的变迁。所谓“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经过也”^[22]，这一时代便正式宣告结束。

但在北部湾地区，三国时期的交趾仍是对外通商的一大口岸。东汉末年，天下扰乱，唯独交州比较安宁，社会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并逐渐取代了徐闻、合浦而成为北部湾对外贸易的中心。此时交州的地位日显，扶南、林邑等东南亚国家遣使奉贡从沿海先达交趾，再由此东航北上至建业^[23]，《梁书》亦载：“其国（大秦）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24]。文献记载交州琳琅满目的域外物品，可略见当时作为北部湾地区贸易中心的地位。孙吴官员薛综上疏提及交州时，将羁縻交州的目的直接指向交州的珍玩：“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25]公元226年交、广分治，广州统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6]，合浦从交州分出，归入广州。作为“两粤通交趾之咽喉”^[27]和“经略海外的基地”^[28]，合浦除与交趾密切的贸易关系外，还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如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吕岱征交趾，“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29]至于三国时期合浦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由于史书简略，不敢妄断，但以当时交趾的地位而论，想必多是采取短途的接力方式，通过交趾市场整合融入海外贸易体系中。此时的合浦港，更多的是作为一般的贸易港口和补给点，而非汉代那样的贸易中心了。

考古资料也折射出航线变迁带来的经济衰退。合浦的三国墓，墓葬规模小，出土器物相对较少，特别是与海上贸易相关的珠饰，更是罕见。如以三国墓为主的寮尾墓地，多为结构简单的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中陶器居多，铜器很少见。25座三国墓中，仅属于东汉晚期向三国过渡时期的M19b（分期归入三国），出土肉红石髓耳珰2枚、玻璃串珠168颗。随葬品的减少和随意，固然与厚葬之风衰落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汉时期作为主要贸易商品的珠饰，风光不再，合浦港的繁荣局面已是今非昔比。

第三节 合浦港衰落的历史启示

自武帝始，至东汉末的三百余年间，合浦因港而兴，亦因港而衰。汉武帝水、陆并举的对外交战略格局，给北部湾地区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位于航线一端的合浦迅速发展为岭南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一跃成为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贸易往来的桥头堡。政权更替，三国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无疑是合浦港衰落的主要原因，至于有学者把南流江水域的变迁和合浦港的兴衰紧密联系^[30]，其词则略显夸大。我们认为，合浦港的衰

落，除客观因素外，与港口集散区的外贸产品生产能力不足最为密切。

港口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港口为枢纽的集疏运网辐射腹地的大小。汉代岭南的交通，多依赖水路，合浦的北面、南流江与北流河之间有分水岭，民间称“鬼门关”，货物特别是大宗的货物，转运极其不便。再往北，沟通南北的灵渠，自开凿以后，通航利用很有限，也并非畅通无阻，屡次修浚屡又淤浅^[31]。故北部湾地区与中原的交通，特别是大船运送大宗货物，多沿东南沿海，取道长江口，进入中原。不但路途遥远，还“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可谓艰辛。

上述因素制约了以贸易为主的合浦港的辐射能力，而且在有限的港口集散区域内，没有形成规模化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来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珍珠、丝绸和瓷器的生产，便是很明显的例子。

采珠业是合浦经济的支柱产业，珍珠也一直是当地贸易的主要商品，但苛严的管制制约了合浦采珠业的发展。由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如同盐铁官营，采珠业由政府控制市场，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民间贩卖。早在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景帝就颁诏，“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32]《南州异物志》也有记载，“合浦民，善游采珠。几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33]。岭南珍珠的另一产地海南岛，西汉刘向在《古列女传·珠崖二义》中也载珠崖令遗属奉丧过海关，误携珍珠，为关吏搜出，几被处死，后幸免。依据是“法：内珠入于关者死。”^[34]。三国时期，迎来了自西汉以来珠禁最严酷的年代。“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35]苛政严法，使得合浦的采珠业逐渐萎缩。

汉代的丝绸纺织业已具相当规模，西汉长安城内有国家经营的纺织工场，名为“东、西织室”，在纺织业发达的齐郡临淄、陈留郡襄邑县（今河南睢县）也设官营工场，有专职管理。当时纺织业相对集中和发达的中心有三个：一是山东、河南及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徐淮地区），为黄河下游四省相连的大片地区；二是以两湖为中心的楚地；三是四川平原及附近地区^[36]。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M2出土4台织机应是蜀锦提花机模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武帝时期织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7]。而这一时期，合浦的丝绸生产能力应还很有限。据记载，当地的丝绸纺织兴起很晚。明崇祯年版的《廉州府志》载有合浦及附近种桑情况，其中“钦州桑二千株，合浦县桑六千一百二十二株，灵山县桑二千株”^[38]，种植桑树的数量很少，可知当地种桑养蚕之业并不发达。清代乾隆年间，廉州知府周勋硕、康基田等提倡农民种桑养蚕，开始有缫丝业。县内常乐镇素有“蚕乡”之美誉，光绪年间有黄丝销往香港。抗战后期，常乐约有200台织布机，全镇劳力大都从事缫丝、纺纱织布的工作。本地蚕丝不够，从广东肇庆、广西平南贩回^[39]。虽随着大量中原人口的南迁合浦，带来了先进的牛耕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其中也应包括先进的纺织业，但纺织业未能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人口少、种桑面积有限，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故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杂缁，只能来自朝廷有限的赏赐。

北部湾沿岸地区亦不具备生产精美陶瓷的能力，更未能形成相应产业，未参与到之后以输出陶瓷为主的海外贸易。合浦当地的高岭土矿蕴藏丰富，完全具备制作瓷器的条件，但产品主要为各种各样的陶器，到东汉晚期，也仅有部分高温釉陶。工艺成熟的瓷器多为外地传入，如秦至西

汉早期双墩土墩墓所见的瓷器，来自吴越地区。直至三国，岭脚村 M4 出土一批包括无耳罐、四系罐、广口罐、盂、钵、碗、杯等青瓷器，研究者也认为：“明显具有三国时期东吴的江苏、浙江一带吴地产品特征，应是从吴地传入合浦的”^[40]。合浦英罗窑等北部湾沿岸的唐代窑址，从前期调查和试掘的情况来看，也多为六系罐等质地一般的高温釉陶。发展到宋代，北流河流域的容县岭垌窑、藤县中和窑已能烧造质量上乘的青瓷器，但这些产品却是顺河北上，进入西江，到达广州参与海外贸易。广州是唐宋时期管理对外事务的市舶司所在地，也是当时最大的港口之一。由于官方的海外贸易政策，北部湾地区受到严格的限制，加之北流河和南流江之间分水岭阻隔造成的运输不便，未能实现从合浦出海的远洋贸易，进而带动当地陶瓷业的发展。

不过，随着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唐宋时期虽出现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著名港口，但北部湾地区的合浦、钦州凭借自然和地理上的优势，依然是当时中国海上对外交通的港口，发挥着不小的作用^[41]。宋朝在钦州地区设置了钦州博易场，由政府主导，与周边附属少数民族及小国家互市贸易。钦州博易场对外商贸发达，“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钦州博易场中往来贸易的人群既有“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的交趾蛮，有“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的富商，还有自“永安州移牒于钦州”或“遣使来钦”进行贸易的安南等东南亚各国商人、使臣。至南宋，钦州更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42]。尽管如此，相对于汉代合浦港的重要性和对中西贸易格局的影响，此时北部湾地区的互市贸易就很难同日而语了。

纵观历史长河，在相对长的历史时期，环北部湾地区都是国际性的水陆交通要冲，是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通道和纽带，因而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43]。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当地居民就借助海洋与东南亚地区交往，之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现广西一直属于沿海地区，铸造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以及延续到唐宋时期的重要地位，但从明代起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行政管辖的变迁，广西成为内陆省区，断绝了与海外的直接交往，相对于广东，慢慢处于落后的状态。如今，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给北部湾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从历史中得到启示，打造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成为广西崛起的重要命题。

[1] (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卷六一、《汉书·西南夷传》卷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694、3841 页。

[2] 王子今：《汉武帝时代的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

[3] 傅宪国：《论有段石铎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 年第 1 期。

[4] 安志敏：《马来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考古》1965 年第 6 期。

[5]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70 页。

[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836~2839 页。

[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839 页。

[8] (汉)班固：《汉书·贾捐之传》卷六十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830~2835 页。

[9] 曾昭璇：《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2 期。

[10] 比如安赋诗认为，云南和岭南两地并入汉帝国的进度不一，可能是由于云南土著居民在经济上并入汉王朝体系的节奏较慢造成的。参见安赋诗著，赵德云译：《边疆和边界：汉帝国的南部边陲》，《南方民族考古》(第 6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年。

[11] 王赛时：《古代合浦采珠史略》，《古今农业》1993 年第 3 期。

- [1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6页。
- [13] J. W. Lankton, B. Pongpanich, B. Chaisuan & B. Gratuze. 2009. Guangxi glass vessels in peninsular Thailand: interpretation of chemical analysis. 19th Congress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IPPA), Hanoi, Vietnam. oral report.
- [14]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 [15] 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海洋史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 [16] 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瓯骆汉风:广西古代陶制明器》,香港历史博物馆编,2014年。
- [17]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753页。
- [18] (西晋)陈寿:《三国志·王楼贺韦华传》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64~1465页。
- [19] 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98~99页。
- [20] 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 [21]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3~27、100~122页;许永杰、范伊然:《中国南海诸岛考古述要》,《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
- [22] (唐)姚思廉:《梁书·扶南传》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87页。
- [23] 张金莲:《六世纪前的交趾与内地交通》,《学术探索》2005年第1期。
- [24] (唐)姚思廉:《梁书·中天竺国传》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98页。
- [25] (晋)陈寿:《三国志·薛综传》卷五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52页。
- [26] (晋)陈寿:《三国志·吕岱传》:“(吕)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43页)
- [27] 陈玉龙:《历代中越交通道里考》,《东南亚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28] 顾裕瑞、李志俭主编:《北海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11~13页。
- [29] (晋)陈寿:《三国志·士燮传》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3页。
- [30] 廖国一、曾作健:《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
- [31] 《新唐书》有“(灵渠)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等记载。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5~1106页。
- [32] (汉)班固:《汉书·景帝纪》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3页。
- [33] (汉)杨孚撰、吴永章辑校注:《异物志辑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 [34] (汉)刘向:《古列女传第五·珠崖二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7页。
- [35] (唐)房玄龄等:《晋书·陶璜传》列传第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1页。
- [36] 刘兴林:《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纺织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
- [3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
- [38] (崇祯)《廉州府志》卷四,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63页。
- [39]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
- [4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岭脚村三国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1] 徐亦婷:《古代广西的对外交通》,《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 [42] 廖寅:《宋代博易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 [43] 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铏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史语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分,2010年。